



讀者參考叢書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13

感受昨天

知识界的方术迷恋

玩传销的女人们

96全国足球甲A联赛技术述评

世界瞩目的海权之争

启

事

一、学林出版社自1997年元月起迁入新址上海出版大楼。大楼位处漕河泾地区的钦州南路81号。邮政编码：200233。电话：64519008(总机)、64515005(办公室)、64515006(编辑部)、64515007(经理部)。

二、《读者参考丛书》1997年度第13至18辑预订工作已届尾声，凡年前漏订的读者，请径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并将预订款邮汇至上海市永嘉路25弄8号(电话：021—64376941，邮编：200020，联系人：陈丽娟)。《读者参考丛书》本年度共出版六辑，逢双月出版。每辑18万字，定价4.80元，全年预订款33.20元(含邮费15%)。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1997年1月

感受昨天

读者参考丛书(第13辑)

1997年2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金 辉 洋 叶

封面设计：仁 坚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200233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邮政编码：20002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万

ISBN 7-80616-105-8/Z·16

定价：4.80元

目 录

-
- | | |
|----------------------------------|--|
| 4 “九大都市圈”
——21世纪中国区域布局的
构想 | 55 必须改变板块式国资管理 |
| 8 究竟什么是民族工业? | 56 董事会制将成为国企重要
领导体制 |
| 10 关于人的素质 | 56 经济总量平衡明显改善 |
| 13 铲除“寻租”治腐败 | 56 中国将按收入线分配住房 |
| 15 安理会改选：几家欢乐几
家愁? | 57 房地产中介收费有规定 |
| 16 世界瞩目的海权之争 | 57 “引智工程”不可忽视 |
| 18 知识界的方术迷惑 | 58 股市热点：“上证30指数” |
| 21 玩传销的女人们 | 60 国债热销后的再思考 |
| 24 “知青”又“上山下乡” | 61 中国“读书人”收入榜位排
前 |
| 25 李辉与袁鹰谈周扬 | 62 跨越“消费断层” |
| 27 怀念雪峰同志 | 12 我国将大力发展非处方药
物 |
| 31 作为标本的刘晓庆 | 63 感受昨天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
(1949—1976)小说卷序 |
| 33 聂卫平与中央首长们 | 68 学术复兴的当下语境
——1996年学术图书走势的
文化心理分析 |
| 38 拆掉胡雪岩的牌坊 | 75 情感和理智的较量
——20世纪的两大钢琴流派 |
| 40 诗人田汉之恋 | 77 电影业的时尚与新生 |
| 43 叶浅予的感情生活 | 79 中国最高艺术殿堂来者不
拒 |
| 46 永不能赴约——追忆余纯
顺 | 80 流行文化“玩”精英文化 |
| 50 赞美你的配偶 | 80 林语堂论中西艺术 |
| 51 中国青年家庭的四大趋势 | 81 寻觅优秀的女人 |
| 52 不可忽视夫妻间隐形冲突 | |
| 53 如何评价我国现代化水
平? | |
| 54 国企改革进入关键时期 | |
-

- 83 都市人生育性别观转向
- 84 驾车靓女
- 86 揭开男人的谜
- 89 人类为何苦寻外星文明?
- 90 敦煌沙暴亲历记
- 91 阿尔金山: 举世罕见的生物地理区
- 92 消除对温室效应的误解
- 93 90年代为何天灾频仍?
- 94 曹聚仁与胡适的一段纠葛
- 95 齐白石的晚年
- 95 闲话皇帝幼时的奶妈
- 97 一个历史的足迹
——追忆1988年采访戴厚英
- 102 拼命才女:《李嘉诚传》、
《曾宪梓传》的作者夏萍
- 106 台湾女作家风景线
- 108 丹尼尔·斯蒂尔——
美国畅销书女作家
- 109 尼克松夫人在中国
- 112 国民党政府审判张学良
实况
- 114 最后的炮击
- 115 人生的“附件”
- 116 人生“四耐”
- 116 悲哀的爱
- 117 厄运
- 118 度的漫步
- 119 '96全国足球甲A联赛技术述评
- 123 登山成了名流时髦
- 124 国际奥委会历任主席
- 124 运动员鼻梁上贴的是什
么?
- 125 家庭青春期教育
- 126 当代儿童最需要的性格
- 127 给孩子终生受用的六个
秘诀
- 127 儿童智力测验勿滥用
- 128 孩子学习的“关键年龄”
- 128 英国教育家发现男孩与
女孩分班学习更易进
步
- 129 莫扎特与智商
- 130 长江流域:21世纪世界规
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
- 130 中华名瀑
- 131 我国九大名亭
- 132 安阳实为“第七古都”
- 132 古都洛阳多石窟
- 133 华佗故里药材之乡
- 134 广州城里人热衷下乡务
农
- 134 鼓浪屿的钢琴曲
- 134 九寨沟、黄龙正面临灭顶
之灾

135 上海出现留学归国人员
企业群

136 香港传媒面面观

139 澳门的公共交通

140 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

140 台湾“扫黑”，一批黑社会
头子落网

141 加拿大纪行

143 瑞典人看世界

145 追求简朴生活

146 海牙琐记

148 欧洲人的不同嗜好

148 泰国取缔人妖表演

149 航班是如何编号的？

149 鸟类为何会撞飞机？

149 双轨火车为何靠左行驶？

150 如何收藏空调机？

150 日美欧音响品牌与风格

151 影碟机“小病”自己治

151 社交“十戒”

152 如何识别药物变质？

152 祖国地名有深意

153 故宫里的为什么

154 现代书画常见作伪手段

155 全球大城市的类型

155 世界未来八大建筑

156 哪些蔬菜原产国外？

157 库尔德问题的由来

158 希伯伦问题

159 巴以冲突的历史缘由

118 忍耐·戴口罩

启事(160)

封面摄影 原载《知识与生活》

封底 航天科学与艺术 原载《科
学画报》汪春编

经济学家王建访谈录：

“九大都市圈”

——21世纪中国区域布局的构想

赵忆宁 朱 剑

1994年底，我国城市以仅占全国国土16.9%的面积和占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72.3%的工业产值，容纳了全国43.7%的就业人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在有限的国土资源条件下我们应采取哪种区域布局模式更为合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与日俱增，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博士提出的“九大都市圈”的设想，为区域布局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记者：城市是工业的载体，随着人类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目前全世界城市化指数平均值为40%左右，发达国家达到70%，而据联合国预计，到下个世纪世界人口将有一半居住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以年均0.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底，我国设市城市已发展到640个，居住在城

镇地区人口达3.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29%。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会迅速提高。

王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一般也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我们的研究预测，到2010年我国约有人口14亿，按照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要求，城市化率至少要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

记者：城市化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占地规模和居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我国土地资源并不丰富，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近90%，平原面积只占不到12%，因此城市如何布局对合理利用资源、推进工业化建设至关重要，你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区域布局理论，是否基于这一基本国情？

王建：特定的国情决定特定的战略，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平原占地少，在不到12%的平原面积中，坡度小于8度的平耕地面积有12.9亿亩，约等于国土面积的9%，也就是说只有占国土3%的平原可以用作城市和道路占地。根据这个国情，我们以日本的“都市圈”模式

为基本参照，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即以我国经济力量较强的大城市为中心划分九大都市圈，以大城市为骨干，在各都市圈内分别部署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的区域布局模式。设想中的九大都市圈的划分是：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在内的京津冀都市圈，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沈大都市圈，包括长春、哈尔滨在内的吉黑都市圈，包括济南、青岛在内的济青都市圈，包括武汉、长沙、南昌在内的湘鄂赣都市圈，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成渝都市圈，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包括南京、扬州、合肥在内的长江中下游都市圈，包括上海、苏锡常宁杭在内的大上海都市圈。

记者：我国自“六五”以来都把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许多划分经济带的方法，比如“沿海与内地”，“东、中、西”，和“七大经济区域”等，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也有若干种其他的不同划分。你的“九大都市圈”的划分与这些有什么不同？

王建：以往的这些划分没有明确区域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比如沿江经济带的划分根据只是其地理特征，而从铁路货运所代表的省际交流情况来看，1994年湖北与省外的经济交流，只有不到19%是在沿江流域，四川的比重更低，还不到12%，这两省的省际经济交流主要是南北向而非东西向的，所以沿江经济合作虽然嚷了很多年，却

一直难以取得显著成效。我们提出“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就是要从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未来15—20年的特定工业化阶段内逐步改变我国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结构为都市圈式的区域结构，并以此来带动区域经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记者：当代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曾建立了多国经济模型，意图研究何以不同的工业化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我想你也是在作类似这样的工作，意图建立中国的战略模式。那么你的“九大都市圈”模式建立的理论 and 现实依据是什么？

王建：他们的结论对我们研究区域结构问题有极大启发：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的变化，即总需求的水平或人均收入水平，和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即资本、劳动力和人均资源条件。供给结构不同是发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政策应当考虑的重点。资本、劳动力和农林矿产资源条件可以流动，唯有土地不可以流动，不能通过贸易来获得。工业化的展开有赖于城市化的推进，但是庞大的城市群只能建立在平原，所以对平原面积匮乏的国家来说，只能在既有的平原面积上谋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

我们看到，美日两国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情况。美国国土辽

阔，平原广阔，人均国土面积和平原面积分别是日本的12倍和35倍。美国的耕地面积在世界位列第一，但只占国土面积的16.9%，平原面积的24%，因而不存在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城市和交通网络的建设，基本上可以不受国土和平原面积的影响。所以美国采取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布局模式和以中小城市为主的都市化道路。如果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都市化建设和布局交通运输网络，1991年日本的城市占地就要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5.3%，交通网络占地就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6.3%，两者相加达41.6%，比日本的全部平原面积比重还高出17.6个百分点以上。按美国的区域经济建设模式进行工业化建设，日本的农田面积全部被占掉还不够。因此日本根据本国的国土资源条件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形成了东京、名古屋、阪神三大都市圈，在三大都市圈内分别部署三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都市圈之间的产业结构接近，彼此间交换需求就少，因此可以大大减少运输网络建设对土地的需求。

记者：我国是世界第三国土大国，幅员面积比美国还要辽阔，但我国又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人均国土资源条件与日本类似。受历史的影响，我国区域布局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请你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区域布局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王建：从目前来看，我国明显表现出自东向西逐级衰减的梯度分

布格局，概括起来看，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全国平均为38.6万元，东部地区515万元，中部地区53万元，西部地区5.7万元，即大约每一个梯度相差十倍。大部分省市和自治区从总体上看，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经济区，“南轻北重、东轻西重”的工业分布特征就是其显著标志。铁路运输一般反映省际经济交流情况，1994年在全部国内运输中跨省区的运输要占到34%以上。而日本1979年约60亿吨货流量中，地域内部的货流量占85.3%，地域间的货流量只占14.7%，其中三大都市圈之间的货流量只有1.5%。由此说明，我国以省为单元的产业结构并不独立，而是在省区间展开分工。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区域布局类似于美国，即采取了全国大分工的模式。从铁路省际货运比重看，1988年为54.3%，1994年进一步上升到61.5%，说明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结构仍在发展。如果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仍然维持这种趋向于美国区域结构模式的发展趋势，并按美国的占地水平安排我国的城市和道路建设，到2010年我国的8.4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占据84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8%；道路占地则要达到69万平方公里以上，占国土面积的7.2%，两项相加，已经超过我国平原面积4个百分点，即挤掉了全部平原面积还不够，分布在平原上的

十多亿亩农田怎么办？所以，如果区域战略选择不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用与非农用地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不断趋于尖锐。

记者：出现城市与农业严重争地的矛盾是否说明我国原有的布局模式已经不适应城市化发展和资源利用，那么“九大都市圈”布局模式如何缓解这一系列矛盾？

王建：如果采取都市圈的模式，到2010年按60%的城市化率水平计算，城市占地需国土面积的1%，道路占地约2.6%，再加上农村人口和建筑物占地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控制在4%以内；如果到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达75%，城市、农村的人口和建筑占地及道路占地再加上其他要求可控制在4.5%以内。也就是说我国在基本上达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时候，占用平原地区耕地的最大值是3亿亩左右，所以采用“都市圈”的模式从根本上缓解了城市化和农业争地矛盾。

另外，都市圈模式还可以根本缓解我国运输紧张的状况。在各大都市圈内都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结构，这样就可以把原在各都市圈外的运输转为圈内的运输，从而大大减少区域间的交通运输需求。如果跨省市经济交流被压缩到类似日本的15%以内，就可以减少25%左右的运输需

求。所以根本上解决交通运输瓶颈的希望，并不在于交通运输业本身，而在于选择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记者：按照都市圈模式重组我国区域经济，势必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原有区域格局，这就必然对原有的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冲突。

王建：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重复建设”，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又被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强化，各级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在看到市场需求后都认为自己有理由另搞一套，最后是形成了各搞一套的局面。提出这个设想，明确了在未来10—15年内可以进行重复建设的界限，针对到2010年的远景目标和目前的基础，应该对圈内的产业结构进行填平补齐，对圈外其他地区则要按照需求与供给结构相对应的规律，根据其人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适当安排建设项目。按照都市圈的划分把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放在九大经济区域内，为此就需要把原属各省的经济权限上收到都市圈一级，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或市场边界与管理边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才能把国家有计划的指导与市场为配置要素的基础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都市圈内的各省仍可独立存在，但作用已应转向农业、交通和文教卫生等管理方面。

（摘自《瞭望》）

究竟什么是 民族工业？

水 皮

九月上旬，无锡小天鹅洗衣机公司和西门子的合资企业来北京开新闻发布会，中方的老总显得忧心忡忡，到处打听政府的外资政策是不是要变了，而轻工总会的头们似乎心中也没底，因为新闻媒介近来对啤酒合资现象的报道倾向越来越出乎他们的意料，小天鹅合资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老总在问，振兴工业的路子不只一条，合资也该是一种允许的尝试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效果？因为啤酒合资现象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个近年来见报频率越来越强的极富感情色彩的字眼，即“民族工业”。

印象中，振兴民族工业的提法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改革开放之前无所谓民族工业不民族工业；改革开放之初，也还没有到确定工业性质的地步，自然就更谈不上振兴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振兴民族工业的提法最初始自一些企业家之口，现在说得多点的也还是一些工商企业界的朋友，比较严谨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则极少使用这个字眼，高层领导人则从未就此发表过评论。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大陆伊始，国内的一些著名老牌汽水厂家就坐不住了，如何抵御“洋水”的冲击曾经在各种媒体上喧闹一时，打嘴仗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所以能在中国如此“横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崇洋媚外，一点面子也不给“国货”，全然没有一点“爱国心”，两大“洋水”除了牌子硬、实力强之外，最主要的是把碳酸饮料的概念引入了中国，中国老百姓从此知道除了苏打水之外，在喝的方面还有更多的选择，就如同到了今天人们猛然从顶入中国的“红牛”饮料身上知道了还有功能饮料这种东西，知道了在喝什么的方面还有那么多的讲究，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间，人体所需的营养是变化的，缺什么喝什么已经在国外形成了一种时尚，而这种“喝法”也早晚会成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热衷。耐人寻味的是，当初把胸脯拍得山响，把振兴民族饮料工业大旗舞得满天飞，号称要和可口可乐决一死战的南方某可乐厂的厂长，在不长的时间之中也投入了可口可乐的怀抱，企业成了人家的罐装厂，而本人则成了人家的远东代理。这么大的弯子是怎么转的？如果从道德人格的角度去观察就太苛刻了，比较能够接受的解释就是这种口号与实际行动的反差都是一种法人行为，再难听点是一种商业行为，广告行为，谁当真了，是你自己的事。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有

志和“洋水”“洋货”叫板的中国企业家都口是心非，事实上“实业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化在生产经营上、产品质量上，以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说话。“红牛”的老板是华裔泰国人，在他的眼中，振兴民族饮料工业之类的口号不外是国内企业家打的一张政治牌，无非还是想寻求行政保护，而事实上，这种保护是不可能再实现了，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决定了这一点，中国加快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也决定了这一点。

但是“民族工业”毕竟是一个很煽情的字眼，而这个字眼又极易归属意识形态，这就难怪啤酒合资现象的报道会给合资企业的中方企业家们造成这么大的思想负担。

可是，就是很少有人去想，究竟什么算是民族工业，它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民族工业这个概念现在还适用不适用？

实际上民族工业是有特定历史涵义的，指的是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针对宗主国的垂直分工而独立发展的工业。就像我们在谈论和民族工业的涵义相近的民族资本这个概念时，对立比较的是特定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一样。而当今世界，任何一国的工业定位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个总格局和大环境，那么，还有什么孤立存在于全球产业之外的纯粹意义上的民族工业呢？

实际上，沿用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工业概念，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比如，产业、产品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民族工业是否属于非全球工业，生产非全球产品？我们说桑塔纳是国产车，但是它的核心技术都是德国的，甚至品牌都是德国的，德国大众把上海大众视作其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零部件的80%却在中国生产，整车也在中国组装，上海大众算不算民族工业？

如果以土生土长的国内工业为民族工业，在概念和实践上也很难划分。以啤酒业为例，你只能说没有合资的燕京啤酒是民族工业，五星是合资了，但商标依旧，你能说它不是民族工业？五星啤酒中，中外方的股份分别是40%和60%，难道40%算民族工业，60%不算？再比如青岛啤酒的H股在香港上市了，这么一个有A股又有H股的股份公司算不算民族工业？

事实上，现在国际上一般规范的提法都用“国内工业”这个概念，其外延包括在本国国界内由本国居民经营和中外合资的工业，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只有保护幼稚工业的提法，而没有“民族工业”的提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行业中，比如啤酒业，中外合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多一点，和外国制造商品进占国内市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合资企业生产的采用外国品牌的商品同“舶来品”混淆，进而歧视、排斥、压制，而应该鼓励合资

关于人的素质

——王元化与胡晓明对话

胡：我了解最近你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王：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人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公众领域，诸如社会服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道德问题，都说明了人的素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敬业精神的缺乏、工作的粗劣、服务质量的低下、法规意识的薄弱，以及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争吵、打斗以及欺、瞒、骗、诈、钻空子、耍流氓大行其道等等。近来报纸动员大家参与探讨这个问题是很好的。现在报上的舆论又变为指责人的素质不好，有的甚至义形于色，痛加谥骂。但我觉得，提高人的素质，不能靠义愤，而需要冷静的思考，作理性的研究。人的素质今天确实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胡：比较通常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议论：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

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同真正的进口货竞争，减少或替代进口，这才是保护国内工业的明智选择。

用一个三十年代的概念来比照九十年代的社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是很正常的，而媒介的传播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不正

不可疗救的人种，或者归之于市场经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世风日下之类九斤老太式感叹，等等。现在又充斥于一些文艺性的小品、杂感式的随笔。我常常也觉得这种文人式的感慨无济于事，只能算是“有病呻吟”而已。

王：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人的素质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不可仅仅归之于文化问题。人的素质与教育更有密切关系，但也不可仅仅归之于教育问题。不容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大量文盲的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下降，因而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我过去说过，很多人也都说过。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人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尊重和维护，也就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

常的。最近国务院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限就是中国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一个信号，可惜的是，这样的信号从媒介对啤酒业合资现象的大肆“炒作”中是得不出来的。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文明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是单单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制定吐痰罚款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也就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一切只须服从命令听指挥，自由活动的天地是很小的。可是由于一种反拨作用，一旦命令有所不及，指挥有所不逮，在严格禁地外出现了一片空白，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放纵为所欲为的小天地。在这里受惯拘束的人可以绝对自由，把公德置之度外，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成为毫无群体观念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了。

胡：依我个人之见，西方思想较多关注权利所体现并与自由相关联的价值的重要性，而中国传统思

想则更多关注权利所体现的道德与人伦与人的义务相关联的价值的重要性；西方较多考虑“法律权利”的实践性，而中国则较多考虑“道德权利”的理想性。你所思考的“公民意识”，其学理进路其实正关联着中西方思想的双重含义，在我看来，不仅仅是目前人的素质的讨论，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问题上，也不失为一条有建设性的学术进路。

王：我们的思想家们大多不太善于吸取经济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因而议论往往不免流于空疏。譬如，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在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我熟识的友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想当然的说法。有一位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围里缩小它的危害，而不能将它消灭。这样一种看法三年前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而该刊总编还曾推许为“非常精辟的意见”。另一位因市场经济出台后，出现了不少批评道德败坏、理想沦丧的议论，因而怀疑发表这些议论的人是不是都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有一位则认为吃饭问题是根本，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好起来。持上述见解的人，有的是研究国学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我听到这些说法，当时很不以为然，曾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

不完整,以及由于钱权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来说明问题。到最近,读了吴敬琏赠送给我的《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本书是一些经济学家于1988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系列文章的合辑。这本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海外学者在研究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一开始就着重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同时采取了打击贪污腐化的司法和行政措施,因而市场化进行得比较顺利,行政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为政清廉(这里并不涉及民主化问题)。而那些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旧的官僚特权和封建特权保留得多的国家(如所谓“印度病”、“拉

美现象”以及菲律宾的所谓“马科斯陷阱”等),腐败现象也就愈严重。这本书中吴敬琏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海外学者(主要是美经济学家A.Krueger)于70年代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寻租活动”(rent-seeking activities)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某些进行市场化的国家的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以致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给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创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里说的超额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

我觉得我们如果多读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分析,大概可以使我们不致仅仅根据自己的有限常识去说一些想当然的话。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为兼顾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用药方便,今后我国药品将划分为非处方

药和处方药两种,全面推广自我医疗。小病患者可到药房选购安全有效的非处方药物,患者可在药师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既免除病人小病也上大医院就诊的烦恼,也减少了医院人满为患的门诊量。据了解,发达国家早已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划分开的方法。过去我国药品管理存在该管严的没管严,该放宽的

我国将大力发展

非处方药物

没放宽等问题,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不久我国药品也将划分为处方药

和非处方药,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细致选择排列非处方药物名单,国家还为此专门成立了非处方药物工作的领导小组。有关人士表示,为推动医疗制度改革,我国将大力发展非处方药物,提高全民的自我医疗水平。预计到2000年我国的非处方药物将不断增加。

(摘自《中华周末报》)

铲除“寻租”治腐败

□邢小群

在北京港澳中心的一次会上，听了吴敬琏先生的演讲。他讲话非常富有逻辑性，敏捷而充满自信。

1996年春天，我请他接受采访。那天，我按时去了他家。他助手交代完事情后，来到客厅。大概潜意识中，我希望多一点对他的了解，虽然知道他很忙，却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提起不久前，我在《读书》上看到的一篇他纪念顾准的文章。我说，听山西朋友高增德说，顾准的一篇遗作，十几年前是您寄到《晋阳学刊》请他发表的。他说，我和顾准曾是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又是“文革”时一个“牛棚”中的难友。他的《希腊城邦制度》写作前，我们在“牛棚”里讨论过多次。他临终时，我守在他的病床前，他把《希腊城邦制度》郑重地作为遗产留给了我。所以我有这部书的版权。说到这儿，他笑了。有一种对自己在“版权”说法上的调侃，更怀着对顾准由衷的敬意。

吴敬琏先生，1930年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从实习研究员任至研究员。1983年至198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社会政策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84

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吴先生在几年前曾提出，治理腐败要釜底抽薪，根除寻租的机会，克服双轨制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秩序。我问他，现在价格、汇率、信贷双轨制已有所改变，人们却感到腐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寻租理论到底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吴先生说，“寻租”理论的现实意义并没有消失。所谓“寻租理论”的核心，是认为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探明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双轨并存的状态。在外汇双轨制的情况下，要让那些涉及处理官价外汇的人不贪污，根本做不到。但是并轨了，市场化了，他想贪污也就没法贪污了。比如，1994年的双重汇率的并轨，就提供了市场化能更有效地消除寻租活动基础的有力例证。谁还会像实行双轨制时那样给管理部门递红包呢？不治本，光治末，那是治不过来的。

《求是》1996年第6期有一篇对

反腐败理论研讨会的综述文章，其中批评一些学者引入的寻租理论，认为，腐败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不是来自行政干预，腐败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吴先生笑着对我说：可他们又不能说现在中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就说资本主义制度毒化了人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就有了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正确地反腐败只能寄希望于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来根除人们头脑中的“利己主义思想”了。不健忘的人都会记得：这正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并使政治和经济的腐败更加猖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逻辑。

我还问到吴先生，目前寻租现象有什么新特点。他说，这几年腐败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由于土地批租中行政权力起了主要作用和由于国家银行贷款的深度负利率，90年代初寻租活动的重点由过去的“商品寻租”转向“要素寻租”，由此造就了一批暴发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出现的寻租狂潮产生示范效应。所有的人都知道权力有价，用权换钱，发家致富。在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本来就太多，加上有些人建立新的寻租条件的活动也很猖獗，寻租现象就像癌症一样在政权系统里面，在干部队伍里扩散开来了。另外有一种新现象，就是有些地方出现了买

卖官职的案件。有些用钱买官的人把贿赂叫做“投资”。实际上就是用金钱买寻租权力。这种现象哪怕是个别的，也应当看成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征兆。因为如果形成一种权力买卖的体系，那可就真的是积重难返了。

吴先生近几年关注的重要问题，还不止于此。比如他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三大难题：产权界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历史包袱的处理。他认为，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当承担类似德国的托管局一样的职能，管理没有改制的国有资产（国家股分财产）。经理人员不受所有者的最终约束，就会出现所谓“内部人控制失控”（一些企业领导人以权谋私）的代理危机；经理人员的任命，应当坚决按照公司制度的国际通行规范来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现有存量资产中的一部分是在国家对老职工的负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职工以前以企业利税的形式交过了社会保障金和住房基金，这个钱到了国家手里已经变成了企业资产。现在算资产的时候，却没有把这个负债分出来，将来到哪里去要这笔钱？谁有这个本事承担？这部分一定要在公司化过程中把国家对老职工的负债从存量资产中分出来。分出来给谁呢？一是分给社会保障基金会，把股权和责任都给基金会。二是在房改的时候用房价扣

（下转第17页）



□丁宝忠

安理会改选：

几家欢乐

几家愁？

1995年可说是安理会历史上开会最多的一年。据统计，全年共开全体磋商会议和正式会议387次，作出决议66项，发表主席声明63项。

不管是牵涉到全球的、地区的，还是某个国家的事务，凡提上联合国的，都得拿到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不仅“权”大，而且有“利”可图：进入了这个“象牙之塔”，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对于国际事态的发展可以争取主动。因此，除了那5个由宪章保护而“雷打不动”的常任理事国（中、法、俄、英、美）和5个任期还有1年的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185个会员国中的其余国家，都把眼睛盯着一年一度的安理会改选。

按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主要

责任。它根据宪章作出的决定，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执行。它可以调查任何国际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局势。它可以判定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并可采取经济、军事行动来对抗。它还向大会推荐新会员国和秘书长。总之，安理会是联合国唯一带有终审性质的权力机构。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为：亚洲和非洲5个，拉美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由联大表决产生，任期2年，每年改选5个，不能连选连任。每年年底，联合国大厦里为入选安理会而进行的拉票活动进入高潮；有的国家为了在以后再次入选，“卸任”之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说游。

1996年10月21日，安理会举行了最新一轮改选。结果，哥斯达黎加、日本、肯尼亚、葡萄牙、瑞典当选，分别取代任期将满的洪都拉斯、印尼、博茨瓦纳、意大利和德国，从1997年1月1日起，与尚有1年任期的智利、埃及、几内亚比绍、波兰和韩国一道，享受执掌安理会表决机器的大权。

1996年作为亚洲区名额的日本以142票对40票战胜印度入选颇为引人注目。另一项出人预料的事，是作为“西欧和其他国家”名额的葡萄牙以124票对57票击败澳大利亚入选。日本成了最大的赢家，印度和澳大利亚成了最大的输家。

（摘自《天津日报》）